

文化哲学： 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

王宏宇 著

014007857

G02

26

图书馆藏书

——青年学者·述读孙海潮哲学论文：学哲论文

? 6105 ·孙海潮学术文集 ·第 1 集

文化哲学： 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

王宏宇 著



北航

C1694690

G02
26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0140048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 / 王宏宇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 - 7 - 81129 - 636 - 5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哲学 - 研究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4252 号

文化哲学：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
WENHUA ZHEXUE : SHIJIAN ZHEXUE DE DANGDAI XINGTAI
王宏宇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林召霞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1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36 - 5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实践哲学的文化阐释	27
第一节 西方实践哲学的理论演进	27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内涵	38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宗旨	58
第二章 20世纪文化哲学的兴起	65
第一节 文化哲学兴起的背景	66
第二节 20世纪文化哲学的特征	79
第三章 文化哲学:实践哲学的新形态	110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文化哲学意蕴	110
第二节 当代文化哲学对实践哲学思路的拓展	122
第三节 文化哲学建构的若干原则	134
第四章 文化哲学的现代意义	159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景观	159
第二节 中国文化重建的主题和理论宗旨	170
结 语	192
参考文献	194
后 记	215

思家是唯物论，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二来：没有将自己彻底抛弃，继续坚持唯物辩证法，二来：没有完全抛弃自己，资本主义的人如何想，指祖人古国中是好好的，但革命的人必须摒弃“余孽”如“国民党”“新军阀”等；三王武昌起义的士气和精神状态，对“首义”一词有感。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两个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义”即“中”“合而为一”的统一，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义”即“中”“合而为一”的统一，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 论

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这两个名词既被用来表述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向，又被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建构模式和理论形态。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践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的兴起也成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两种理论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理论形态都不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正在进行”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文化的视角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当代形态。文化哲学的视角本来就内在于实践哲学之中。

何谓实践？何谓文化？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有多种解释。实践

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第一，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第二，认识论角度的实践，指的是和“认识”或“理论”相对的人类活动，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知行合一”中的“行”。毛泽东把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分为三类：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第三，道德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实践，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第一种意义上的实践范围最广，能够涵盖第二种实践和第三种实践。笔者基本上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

据说文化的定义有 200 多种，但文化概念的基本意义都是指和“自然”概念相对的人的活动。从古至今，“自然”与“文化”就是支配人类生存的两种力量。“自然”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其一，自然是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广阔的世界，它代表着永恒不变的必然规律，无论人类存在与否，自然都以同样的规律和节拍在运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自在的、纯客观的自然界确实具有对人的存在的优先性，但这是与人的存在无涉的自然界，对人而言是无意义的。其二，它是人的活动对象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借助人及人的对象性的活动而获得规定性的，是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人的实践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自然界。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人同时诞生的。因而马克思说，人与自然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关于它们的存在有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个证明就是人的现实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而且是现实的感性世界存在的根基，是人类历史得以生成和存在的根基。因而文化和自然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化的规律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及成果

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使得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这个人化的自然界,也就是现实的人类生活的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也就是人类文化的世界。对这个文化世界的理解必须从人及其活动出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茅盾称“人是最美丽的风景”。

从普通意义上讲,文化是“人为”的力量,是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及其结果,在此意义上相当于“文明”,包含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层面的一切成果。笔者认为,从更精确的哲学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广义的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人的行为模式、生存方式和生活的“样法”,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区所特有的、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而形成的深层次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内在于广义的文化产品之中。笔者所谈的文化,基本上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具体文明形态的最核心要素,比如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朝鲜文化,它们各自的核心要素是不一样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国家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但是这几个同样的或者相似的经济基础,为什么产生出不同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了,所以,文化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并不矛盾,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文化。

由此说来,“文化”与“实践”这两个概念都是指人的活动,只不过思考角度不同,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身,文化是实践活动的内在图式,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样态。人处于动物与神之间,既不绝对属于盲目的自然界,也不可能完全自由,达到神的位置。对实践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就是对人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实践哲学的复兴正是建立在人类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基础上,建立

在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家通过对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和批判，逐步形成了 20 世纪普遍的文化自觉，在文化自觉这一前提下，文化哲学得以兴起。因而，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兴起，都是人类对自身的理论思考日渐成熟的必然结果。

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概念也是不确定的。实践哲学的含义有：第一，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是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核心，以扬弃异化和人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相统一为宗旨，以实事求是和批判现存为特点的哲学样态。这就是现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共识，笔者基本上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实践哲学这一概念的。第二，传统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对“实践哲学”一词的传统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在 20 世纪也有人遵循，如罗尔斯等人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探讨，阿伦特对实践概念的探讨，就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范畴。第三，19 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对实践哲学的其他理解和表述，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等。笔者认为，这三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论关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有待于深入。

文化哲学的含义有如下几种：第一，它是建立在文化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总结和哲学思考，这是最普遍的文化哲学概念，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属于一种部门哲学，它把文化当成与政治、经济并列的社会子系统和实践领域来研究。第二，在精神哲学和人文

哲学意义上理解文化哲学,它是与自然哲学相区别的理论体系,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以生命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为代表。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李凯尔特区分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狄尔泰称为“精神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文化哲学的独特性。第三,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化批判思潮,比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文化批判,舍勒的哲学人本学,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第四,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而是内在于实践哲学构想中的一种“致思理路”和隐含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一种展开形态,但并不是终结形态,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正在深化,笔者要讨论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它和前三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还不能归结为这三种意义之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首先是一种观照实践活动的理论视角,它从实践活动的具体模式方面,尤其是日常生活结构方面来探索实践的深层规律和机制。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点是建立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理解模式和理论框架,并把焦点放在推动对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对现实的革命途径上。到了20世纪,随着对文化自觉和现代西方文化学、文化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政治经济批判转为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得以凸显和展开,这主要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上。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卢卡奇为代表,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人道主义出发进行的文化批判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代表形态。在这些理论表述中，文化哲学从一种内在于实践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变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外显形态。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哲学是理解实践哲学的一种视角，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文化哲学就是实践哲学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路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路径。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的建构应该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思考中发掘文化哲学的意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中的合理之处，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自觉的文化哲学体系。这种文化哲学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一种基于当代情境的出场方式。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或者当代形态是建立在对人类文化模式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批判基础上的。笔者并非想用文化哲学去取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释模式，比如交往哲学、生存论、发展哲学、历史哲学等，这些解释模式各有各的特点和无法被取代的理论优势。但笔者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内在要求，同样具有其他解释模式无法取代的优点，那就是对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的理论探讨，对人的具体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

二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实践哲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古希腊的实践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从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的伦理学传统之后,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了实践概念,并构造了第一个实践哲学体系,随后,希腊化时代的伦理学研究又将实践哲学推向了一个高潮。近代以来,实践哲学从伦理和政治两个方面向前发展,在德国古典哲学之中达到了另一个实践哲学的高峰。但是从哲学范式上看,这一时期的实践哲学仍然没有脱离思辨哲学。而且近代哲学带来了实践内部的分化,促使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的分离,最终导致了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实践的工具和操作层面压倒了价值层面,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思想家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和人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刻反思,这开启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古典实践观的重新探讨。

而作为哲学范式的实践哲学的真正创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开创的现代实践哲学使哲学从纯粹思辨理论的观念世界回到现实生活,掀起了哲学领域乃至整个人类思想文化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自马克思以后,在国际上,关于实践哲学的探讨和建构主要有如下方向: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进行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些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基本框架是奠基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构想之上的。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人道主义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们主张回到马克

思，坚持实践哲学的立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化和实践的人道化。他们从不同角度系统地阐发了各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想，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我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次是西方哲学界其他流派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实践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实践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等人掀起了研究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新高潮，其中流派众多，包括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泰勒和桑德尔等人的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等人的保守主义等。国外学界对实践哲学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各个流派和思潮之间的理论分歧较大，缺乏统一的理论共识和深刻的思想交流。

中国哲学界对实践哲学的研究始于 1978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推动力则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的问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理论界展开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代表作品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王锐生的《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薛德震的《再谈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这些争论成为实践哲学争论的前奏。之后，实践哲学的争论从认识论领域蔓延到本体论领域，并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的整体转换。

围绕着实践哲学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关于本体论和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主要有“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两种表述方式。代表作有高清海和孙利天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高清海的《马克思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陈志良和杨耕的《论马克思的实践唯

物主义》,王南湜的《走向实践哲学之路》、《进入现代实践哲学的理路》,王南湜与谢永康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5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郁建兴的《马克思与实践哲学》,乔瑞金和王涛的《多维视域下的实践哲学研究刍议》,衣俊卿的《论实践的多重哲学内涵》、《实践哲学:超越与升华》,李楠明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历史定位及其现实意义》,张奎良的《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历程的深刻启示》,张奎良和宁丽娜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新在哪里?》等。他们超越了传统教科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以物质本体论为主导的哲学理解范式,确立了实践和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并且对实践的内涵、实践的具体规定加以深层探讨,对实践哲学的种种可能的建构路径加以充分讨论,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大大地推进了实践哲学的研究,大体达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这一理论研究共识,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平台。

第二,关于从实践的各个具体的方向如何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张曙光、邹诗鹏的生存论,丁立群的人类学实践论,任平的交往实践论,韩震的历史哲学,丁立群、隽鸿飞的发展哲学,衣俊卿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文化哲学构想等。代表作品有:张曙光的《生存哲学》,邹诗鹏的《生存论研究》,丁立群的《论人类学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性质》、《哲学·实践与终极关怀》、《发展: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任平的《交往实践和主体际》,韩震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隽鸿飞的《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衣俊卿的《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

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汇处的文化批判》等。他们以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为宗旨，为重新构建马克思哲学的学科体系提供了许多非常好的理论思路。这些理论思路从实践哲学的共识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拓展了实践哲学的思考方向。第三，关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研究，主要有何怀宏、龚群等人对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的研究、对麦金太尔和社群主义的研究，邓晓芒、张志伟、李蜀人、高全喜、李梅等人对德国古典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研究，刘小枫、陈建洪等人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保守主义的研究，洪汉鼎、张能为等人对伽达默尔和解释学实践论的研究等。代表著作有：何怀宏的《契约伦理和社会正义》、龚群的《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诸问题》、张志伟的《康德的道德世界观》、李蜀人的《道德王国的重建》、高全喜的《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李梅的《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刘小枫的《现代人及其敌人》、陈建洪的《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施特劳斯四论》、张能为的《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等。他们关注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以现代社会的问题为中心，倡导和推动了实践哲学研究的多元化态势，提升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研究水平，这种理论局面深化了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上述理论成就也有各自的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首先，实践哲学范式还缺乏一定的理论共识，理论的开掘还不够深入。上述各家对实践的理解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语境之内，而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的实践概念之间的深层理论联系还没有说清楚，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没有更

深入地思考和消化西方实践哲学的理论思考和理论贡献,对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没有进一步引发对实践概念的深层思考。这就需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人为的学术壁垒,寻找把马克思、康德、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实践概念统一在一起的理论基础,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之间的深层理论联系和理论互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内部的理论分歧使得各家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某些理论侧面加以发挥,如生存论、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等,但这些方向和侧面之间的深层理论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跑马圈地”和“拉山头树大旗”的阶段。再次,实践哲学更多地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上,没有充分显示出马克思倡导的贴近具体实践的批判性特征,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就会形成凌空蹈虚的抽象化理论建构和新的“经院哲学”。最后,面对 20 世纪以来人类的文化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文化自觉现象,中国的实践哲学研究缺乏积极的介入,不能针对这种文化自觉做出自己的深层回应。以衣俊卿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提出了回归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命题,他们对文化和生活世界的研究影响巨大,形成了新的理论思潮,但这种回归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有待于深入实践批判领域,进一步厘清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理论关联,建构扎根于中国现实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文化哲学体系。本书不可能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但笔者认为,基于文化和实践概念的高度一致性,21 世纪哲学回归文化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潮流,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的根本宗旨,所以,实践哲学需要凸显文化哲学的意蕴,以文化哲学的面目重新出场。

三

文化哲学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但是文化问题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化和文化危机的加深,文化问题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自觉关注的对象,20 世纪的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普遍的文化自觉,文化哲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随之兴起。普泛的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代表有:泰勒的文化进化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斯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观等。代表著作有:泰勒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文化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这些研究推进了文化自觉,对文化哲学的研究有着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研究本身并不是文化哲学研究,也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西方文化哲学从 19 世纪末开始兴起。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实现了从康德的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的哲学转向。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通过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推动了文化哲学的自觉,他们沿着狄尔泰的思路,恢复文化科学的合法性,消除哲学的自然科学化,把文化哲学从思辨理论哲学的理解范式中解放出来,认为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应该是文化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进一步从文化批

判角度推进了对文化哲学的思考,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论,受胡塞尔这种文化哲学思路的启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也对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了深入论述,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推动了作为哲学理解范式的文化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除此以外,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舍勒、兰德曼等人的哲学人类学,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潮等。这些对文化哲学的思考使得文化哲学成为一种引人注目、影响巨大的理论进路,但是其理论局限在于:对人类实践的文化结构的探讨缺乏一种深层的理论共识,学派之间存在较大分歧,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

受西方文化哲学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焕发了新的面貌。尤其是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大众文化、心理机制、性格结构的批判,列斐伏尔和赫勒等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这些思想推动了对文化哲学的思考,使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之间的理论联系得以凸显,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点从革命实践转为文化批判。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具体运作机制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模式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但是,他们对实践和文化之间的理论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仅仅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面临的文化困境和文化危机还缺乏针对性的探讨。

20世纪西方的文化学、文化哲学和文化批判思潮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和自觉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介绍,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